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编

胡耀邦 在
中国科学院



科学出版社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03-033457-2

I. ①胡… II. ①中… III. ①胡耀邦(1915~1989)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345 号

责任编辑: 侯俊琳 郭勇斌 / 责任校对: 朱光兰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4 插页: 5

字数: 170 00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缅怀耀邦同志 促进改革创新

(序)

路甬祥

胡耀邦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长达 60 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国科学院有幸。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委派胡耀邦同志来科学院主持工作，进行整顿。虽然他在科学院实际工作只有 120 天，但他以无畏的精神，奔放的热情，睿智的才华，高尚的品德，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感染并鼓舞着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使被压抑了十年之久的人们看到了光明，振奋了精神，对未来燃起了新的希望。

胡耀邦同志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是他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推进科学院改革创新、和谐奋进的动力。我们要学习耀邦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大胆进取的精神。耀邦同志在科学院工作期间，敢于冲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潮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不人云亦云，而是从实际出发，倾听群众呼声，“力求弄通”党的正确的科技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辨明是非真伪。他面对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大声疾呼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为此，他主张在科研机构要以科研为中心，所谓政

治统帅科学技术，是指要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做到又红又专，而不是搞空头政治；他认为广大科技人员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应当依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以歧视。他主张“拿来主义”，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不是闭关锁国。

今天，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面对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任务，已经端正了发展方向，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但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已成之局的固化和一定之见的束缚依然存在，因此，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大胆进取，不断创新。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高尚品德。耀邦同志对知识的尊重，是基于他的勤学好思，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马克思主义，学政治、学哲学、学文学、学经济、学历史、学科学……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有知识的人学，向群众学。正是这样，才更深切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他尊重人才是基于对人的尊重。他对优秀的年轻人尤加热爱、推荐和尊重，把全部的希望都奉献给他们；对老干部是充分敬重；对科学家和有知识的人是虚心请教；对做出贡献的人是十分推崇；对有缺点错误的人是以宽容的襟怀，着力帮助，对有严重错误的人也努力挽救；对受冤屈的人则予以同情，努力使他们获得公正；对职工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尽力帮助解决……

正是这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所以他同人们是心气相通、休戚与共的，人们才乐于向他敞开心扉说真心话，他也获得了人们真心的尊重。

今天，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就需要尊重人，并进而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才能同广大科技人员一起，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同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和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

耀邦同志当年在科学院进行整顿，主要是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多年来盛行的极“左”路线的错误，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正确政策，同时也吹响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前奏。他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政策主张，有许多现在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些深邃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如他提出的对政治与业务，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引进与创造等一系列关系的见解，以及在研究所管理中，党委书记与所长的关系，政治、业务、后勤工作的配合，政治工作的任务，理论工作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他以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认真思考二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实践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所得出的真知灼见。我们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正是要很好地、全面地处理好这一系列的关系，以求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也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倍加怀念为科学院的改革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耀邦同志。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院各项工作跃上新的台阶，推进我院科技创新能力上新的水平，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期待，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出版这本书来纪念胡耀邦同志，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为序。

前 言

1975年7月22日，胡耀邦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1月，就因“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打倒。虽然他在1977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才正式离开中国科学院，但他在中国科学院实际只工作了120天。

在胡耀邦一生近60年光辉的革命生涯中，120天只是短短的一段经历，在他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中，可能也只占百分之几，但胡耀邦曾说过，他很怀念这一段时期。这是因为他对我国的科技事业，对我国的科技人才，对中国科学院，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期望。

相比于中国科学院60年的历史，120天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却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史中添加了浓重的一笔，给中国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怀念。

在这120天中，面对当时充满惊涛骇浪的政治生活及奄奄一息的经济和科技，胡耀邦以对党的事业的一片忠诚，把科学院看做是党“最后一次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投入了全部身心，倾注了全部感情，把郁结在心里的对“四人帮”的怒火化成掷向“四人帮”的一支支投枪，同他们进行了正面的交锋。

在这120天中，胡耀邦以他耿直的骨气、无畏的精神，以及他率真的性格、奔放的热情、明快而又诙谐的语言、睿智

的才华所形成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感染着、鼓舞着、长久地影响着人们，使中国科学院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舒了口气，看到了希望，激发了斗志。正是这种影响，使得“批邓”在中国科学院批不起来，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更走在了拨乱反正的前头。

在短短的120天中，胡耀邦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拼了一点老命”，以他充沛的精力，施展才能，同李昌等同志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精神、这种速度、这种效率和效果，是极为罕见的。为便于大家了解，先概述如下：

- * 整顿了院所两级领导班子；
- *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 * 恢复所长、室主任的职权，恢复科研工作秩序；
- * 提出了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汇报提纲》；
- * 抓了科研工作，并着手制定科技规划；
- * 尽量解决群众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进行了思想整顿，拨乱反正，端正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把中国科学院重新纳入“以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目 录

缅怀耀邦同志 促进改革创新（序）

前言

第一章 形势	1
第二章 工作	13
一、“挤掉脓包，搞好组织整顿”	13
二、“落实政策，要只争朝夕”	29
三、“拼了一点老命”起草《汇报提纲》	34
四、“五子登科”为科技人员解忧	42
五、制订规划，抓科研工作	46
第三章 思想	47
一、关于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	48
二、关于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	54
三、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要重视基础理论的问题	57
四、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66
五、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73
六、提倡“拿来主义”	78
七、动员进行“新长征”	82
第四章 风骨	89
一、共产党人的骨气	89
二、非同寻常的调查研究	91

三、好学勤思	94
第五章 挫折	107
第六章 影响	121
附录一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129
附录二 胡耀邦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5
附录三 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纪事	153
后记	169

第一章 形 势

中国科学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这里，领导权被篡夺了，科研机构被拆散了，科研秩序被打乱了，许多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了，科技队伍遭受摧残，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

胡耀邦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1975年7月17日，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胡耀邦谈话，委派他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华国锋转达邓小平的指示，要求抓紧对科学院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着重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并交定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名单。

整顿科学院，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军队系统、铁路系统的整顿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及时把他们的经验推向冶金系统、煤炭系统，以及国防科技、国防军工系统，也都迅速使它们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改观。邓小平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洞悉科技在国家发展

中极端重要的地位，深知科研必须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同时，他对科学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有深切的了解。这从他后来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78年6月5日他接见日本来宾时也说：“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他还说：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邓小平担心科研拖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后腿，因此，他对科技整顿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全面整顿中把它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他把胡耀邦派到科学院，也正说明了他重视的程度。大家都知道，胡耀邦15岁就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参加了红军的长征，他年轻有活力，又勤奋好学，是长征队伍中出名的“红小鬼”。由于工作出色，24岁时就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后来曾说过：“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做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① 胡耀邦就是邓小平慧眼所识的人才。

胡耀邦当然领会邓小平的思想。特别是在他来科学院前不久，在中央读书班聆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当时，邓小平十分严肃地全面讲述了国家的严峻形势，他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铁路、财政都面临危机，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必须下大力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肩负邓小平的嘱托，胡耀邦深知责任重大。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他不会只满足于做些一般的调查、写个报告、编个规划，而是要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正面交锋；要收拾烂摊子，开创新局面；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重新端正到正确的轨道；要鼓舞人们的信心和干劲，立志把科研搞上去，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但是，胡耀邦所面对的是被“四人帮”破坏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的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研究机构基础上成立的。1950年初建时，只有22个科研机构（18个自然科学方面的，4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技术人员不足300人，年经费287.2万元。经过17年的努力，特别是通过《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实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科学院已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职工，其中研究技术人员22000多人，年经费3.55亿元，已经成为学科门类齐全、拥有优秀科技人才、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承担着“尖端（新技术）、重大（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基础（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工作）”三大方面的任务，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技术方面，除新建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领域的研究机构外，还开辟了高温合金、特殊化学材料、超纯金属、超纯分析、高能燃料、水声、稀有元素地质、地球化学、高空物理、微波技术、红外技术、爆炸力学、新型光学仪器等诸多新领域。全院有近半数研究机构中的半数以上的研究技术人员从事新技术和国防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加速器、第一个晶体管……，而最突出的是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所作的贡献。

在基础科学方面，集中了数、理、化、天、地、生等方面国内的优秀人才，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突出的成绩，如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发现，有限元方法的创立，叶轮机械三维流动理论的发展，吗啡镇痛作用机理的阐明等。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如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低产田的改造、水产养殖、灾害性天气预报、稀土元素的分离、钒钛铁矿的冶炼，

以及新型合金材料、催化剂、合成橡胶、人工水晶、甾族药物、抗疟药物、计划生育药物的研制等。

摸清本国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首先必须做好的工作。科学院在 1955 年就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了 15 个综合考察队、组，对黑龙江流域、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西南地区，以及华南和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盐湖、沙漠等进行了考察，足迹遍及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占我国面积 60% 左右的边远地区。此外还有海洋生物考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土壤普查等。参加单位除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机构外，还有高等学校、有关部委和地方的研究机构与生产部门，参加人数共约 1 万多人次。通过考察，基本查清了我国边远地区自然条件的特征和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及一些分布规律，为自然资源开发和生产力布局提出了综合开发方案和远景设想，并培养了一批科学考察人才，帮助边远地区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在调查过程中以及在调查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提出水土保持的基本方针、沙漠化土地的整治方针等，并在沙坡头试验成功固沙措施，保证了包兰铁路的长期安全通车，等等。

就是这样一个科学院，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

下面，以统计数字反映一些的情况。

表 1-1 中国科学院机构和人员的变化状况（1965 ~ 1978 年）（单位：人）

年份	机构		固定职工	人员			
	独立 机构	其中科 研机构		其中研究技术人员			
				总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1965	135	105	60 258	21 937	688	2 874	18 375
1973	68	53	35 157	13 471	414	1 768	11 289
1975	80	63	48 716	17 054	505	1 874	14 675
1978	153	110	79 755	30 894	1 261	10 380	19 25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统计资料，其中缺 1966 ~ 1972 年数据。

表 1-2 中国科学院历年经费情况（1965 ~ 1978 年）（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经常费	器材费
1965	35 548. 5	12 745. 0	20 803. 5
1973	15 682. 7	7 006. 5	8 676. 2
1975	16 240. 5	5 942. 5	10 298. 0
1978	32 611. 3	12 595. 0	20 016. 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统计资料，其中缺 1966 ~ 1972 年数据。

从表 1-1 和表 1-2 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人员和经费都锐减。人员由 1965 年的 6 万人减至 1973 年的 3.5 万人，到 1975 年才恢复到近 5 万人；经费由 1965 年的 3.55 亿元减至 1975 年的 1.6 亿元，减少约 56%。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已由 105 个锐减为 1973 年的 53 个，有 47 个新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划归了国防科委，使科学院伤筋动骨，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所剩的 53 个研究机构中，有 13 个是直属的，其他均下放地方，成为科学院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研究机构。被下放的研究机构中有些同地方发展很少有直接联系，地方对接收这些研究机构也没有多少积极性，相反却感到是负担。甚至有的地方把研究机构全部打散，按着本地农林牧副业的实际需要整编成服务性质的专业队。如广东省 9 个研究机构就被编为粮食队、林业队、畜牧队、经济作物队和水产队。其中的畜牧队是以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为主，经济作物队是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为主。很难想象，这些被下放到畜牧队和经济作物队的科研人员如何能再从事昆虫或植物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在整编结束后，就有三分之二的科技人员，被分派到全省各地，长期下放插队。表面上看，是同群众一起搞科研活动，实际上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

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历史，从事中国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和利用的研究，研究水平颇高，下放给湖北省后，“立足湖北，面向全国”的科研方向被否定，不能再从事全国性的水生生物

研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部分研究机构被撤销，后来虽然陆续恢复，但是撤销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计的，下面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1. 北京植物园被撤销

北京植物园创建于1955年，其前身是早在1946年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建立的小园子。“文化大革命”前夕，已是一个拥有各类植物4000余种的初具规模的植物园。其中有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葡萄品种600余种，居全国之首。温室拥有各类植物2000多种，也颇具规模。其中保存有外国元首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珍贵植物。植物园同世界几十个国家进行种子交换，它所拥有的种子标本在全国首屈一指。北京市的园林品种，大多由此引出。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植物园一再被扣上“搞花花草草”和“封、资、修”的罪名，备受批判，终于在1970年被宣布撤销。科研人员甚至工人全部下放干校。随之，中央警卫部队进驻植物园，这里就被作为给中央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除了种菜还养猪、养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600余种珍贵的葡萄品种被砍倒锯掉，改为菜园；小柏树被挖掉当柴烧。600余种温室花木中最好的被送到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家里，第二类由北京几个公园任意挑选，第三类拿到花摊上出卖，其余的任其放在温室，无人管理。朱德送给植物园的名贵兰花也都散失。到1973年重建植物园时，原有2000多种花木的温室，只剩下一株薛荔孤零零地攀缘在温室的墙上。冻死的珍贵花木中包括斯里兰卡总理送的菩提树、胡志明送的叶子花及卡斯特罗送的若干棵香蕉树等。植物园原有700多种木本植物，因无人管理，几年中只剩下100多种；数十亩供研究用的果园无人施肥，又遭虫害，几乎全毁；新培育的五六十种正待推广的草莓荡然无存。种子标本和图书资料在撤销后的搬运中损失严重。

2. 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被撤销

1966年以前，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在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科学院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主要方面之一。但是，在1970年1月，这个单位也同样遭到了撤销的厄运，人员被调动或下放干校，器材、物资被处理，综考会的工作完全停顿了。1972年，为了调查全国宜农荒地资源，被下放的综考会人员才被召集回京。

3. 心理研究所被撤销

中国科学院在1950年就筹建了心理研究室，1956年正式成立了心理研究所。此后，虽然研究所的发展几经挫折，但到1966年，已粗具规模，拥有150多人。共设有教育与儿童发展心理、感知觉与航空工程心理和医学生理心理3个研究室，研究实验设备已基本接近国际水平，成为中国一支最重要的心理学研究力量。由于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更容易受到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它的处境就尤为凄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心理学就被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心理研究所因此也被扣上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罪名，所内正常的工作秩序完全被破坏，研究人员遭受批判，“砸烂心理所”成为当时的革命口号。1969年6月，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心理研究所，全所人员几乎全都下放干校劳动，实验设备被无偿调拨给其他单位，房子被占。经科技人员多年辛勤努力建立起来的中国最重要的心理研究机构毁于一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才正式恢复心理研究所。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放合肥

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科技大学奉命迁至安徽，先后交安徽省和三机部管辖，直到1973年7月，才正式回归中国科学院。